

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

下 集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民族出版社

K28

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

下 集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民族出版社

1877

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下集）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政策研究室编

*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11 5/8 字数：290千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精装印数：0001—1,000册 定价：1.80元

平装印数：0001—9,000册 定价：1.30元

书号：11049·8

下集目录

(四) 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贡献

- | | | |
|--------------------------|---------|-------|
| 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 | 齐思和 | (503) |
| 白族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 | 马曜 | (512) |
| 蒙古族在我国古代科学上的贡献 ······ | 李迪 | (518) |
| 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对科技和文艺的贡献 ··· | 邱树森 | (525) |
| 广西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对祖国经济文化 | | |
| 发展的贡献 ······ | 胡起望 莫俊卿 | (529) |
| 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西北边疆简述 ··· | 赵俪生 | (540) |
| 满族文化的来源及其对祖国的贡献(节录) ··· | 金启棕 | (553) |
| 蒙古民族在祖国历史上的贡献(节录) ··· | 讷古单夫 | (562) |
| 披荆斩棘 建设边疆 | | |
| ——古代壮族人民开发祖国南疆的贡献 ······ | 周忠贤 | (565) |

(五) 民族间的“和亲”

- | | | |
|----------------------|---------|-------|
|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和亲问题 ······ | 梁多俊 | (571) |
| 论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 | 刘先照 韦世明 | (582) |
| 汉唐的“和亲”促进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 | | |
| 的友好团结 | | |
| ——批判“四人帮”歪曲民族关系史、破坏 | | |
| 民族团结的罪行 ······ | 肖之兴 | (594) |
| 汉代和亲政策的几个问题 ······ | 任崇岳 | (600) |
| 西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和亲 ······ | 敬东 | (609) |

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 ······ 任崇岳 罗贤佑 (621)

(六) 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节录) ······ 翁伯贊 (633)

历史教学中有关民族战争的一些问题

(节录) ······ 紫 翔 (636)

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 ······ 黄元起 (644)

再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 ······ 黄元起 (655)

略论羌族与东汉战争的性质 ······ 陈可畏 (667)

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评价问题 ······ 彭大雍 (678)

戏曲也必须要正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

关系(节录) ······ 陈永龄 (692)

如何理解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战争 ······ 贾敬颜 (704)

(七) 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 ······ 吕振羽 (719)

谈谈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区别问题 ······ 章 鲁 (731)

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 ······ 冯君实 (751)

民族融合问题 ······ 李维汉 (771)

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融合 ······ 朱大渭 (777)

民族融合与同化 ······ 岑家梧 (809)

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 ······ 瞿林东 (814)

附 录

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索引 ······ (839)

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著者索引 ······ (862)

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齐思和

马坚教授在他的《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一文中说：“据我肤浅的看法，伟大的中国文化主要是汉族同胞的祖先几千年劳动的果实，但不完全是他们独立创造的。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多多少少也有些贡献。”^① 马教授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因他本身是属于少数民族，因之对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文化上的伟大成就，措辞犹未免过谦。其实从历史上看来，伟大的中国文化是各兄弟民族的祖先们共同创造的，各兄弟民族都有很重要的贡献，绝不是汉族所单独创造的。其实即是汉族本身，也是混合了许多大小民族而成的。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个事实^②。从前大汉族主义的历史家，除了战争很少提到我们兄弟民族间的彼此关系，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我们兄弟民族间最重要的关系是文化交流，各种文化汇集混合，才形成了光辉无比的中国文化。这种过程，应该是中国历史家主要的课题之一。不过，这个问题范围极大，需要中国历史家共同努力，将来应当有专书讨论，既非本文所包括，也不是作者的学力所克担当的。本文只能挑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初步的试探。

我想试就农业、饮食、服装、居住、战术、音乐、美术、语言、科学、思想等方面来说明我们的兄弟民族对于中国文化伟大的

① 《史学周刊》第15期（天津《进步日报》1951年4月20日）。

② 《学习》第8期，（1950年10月），第45—47页。

贡献。

先说农业。过去的历史家总以为汉族是农业的发明者，中国的优越的农业技术，完全是汉族的祖先们单独创造的。这种观念是和历史事实不合的。从历史上看来，我们的农业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才到了近世的阶段，在这长期发展中，兄弟民族的贡献是很大的。即以耕种所用的家畜而言，中国农民——特别是北方农民——常用驴骡，这便是少数民族对于中国农业的贡献。在春秋时代以前，住在中原区的“诸夏”，不但不知道用驴骡，并且还不知道用牛来耕种，农业完全依靠人力。到了春秋时代末年才发明了“牛耕”的方法，牛遂由“宗庙之牺而为畎亩之勤。”^①以后马也渐用于农业上去了。但是牛较笨大，而马又较难豢养。到了秦汉以后，驴骡大批地由塞外输入，以后汉人也能豢养繁殖，农民遂得到了两种驯顺耐劳、易于豢养的家畜，对于农业的进展，当然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用驴骡的是塞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

《史记》匈奴传：“匈奴奇畜，即驴骡也。”到现在河套内蒙一带地方尚有野驴。大概匈奴人首先豢养驴为家畜，又将它和马交配而生骡。秦汉以后，才大批地输入中原。《盐铁论》力耕篇：“羸驴駔施，銜尾入塞。”^②可见当时农民所用的驴骡，犹多从塞外输入。此外《汉书》西域传又称：“鄯善国有驴马，多橐它。”“乌弋国有驴无牛”。又可见西域养驴也远在汉族之先。驴骡由塞外西北传入，由北而南，到了三国时期，江南已很普遍。但直到唐代，黔地仍还没有驴。到了元代，统一了塞北西域中原南徼，边疆的家畜大量地输入，至此驴骡之用遂普及于全国了。

在农业方面，我们的兄弟民族不但介绍进来了新的家畜，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并且还介绍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增加了我

① 《国语·晋语》参看江永·群经补义（《皇清经解》卷270，第6页）。

② 《盐铁论》崇礼篇又说：“骡驴駔施，北狄之常畜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

们的生产和享受。在秦汉以前，中原方面农作物的种类并不很多。常见于甲骨卜辞的只有黍和来（小麦），这显然是殷人最主要的食粮，《诗经》里边的谷名有黍、稷、麦、麻、菽、稻、秬、粱、芑、荏菽、秬、来（小麦）、牟（大麦）、稌等十四种，较殷代的农作物种类繁多了。但是现在华北最普通的农作物如高粱、玉米、花生、芝麻、棉花等，都是古代所没有的，秦汉以后才输入中原。其余许多瓜果蔬菜的种籽和种植方法也是秦汉以后才传入的。其中大部分是各兄弟民族的伟大贡献。

秦汉以后，第一批农作物种籽输入中原区是张骞通西域的结果。张骞于汉武帝时，前后出使西域三次。他不但是一位外交家，他是极留心经济文化的人，他将西域的文化介绍到中原，对于中原的经济艺术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沟通中原和西域文化方面，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西域处在中印、印度和西亚之间，历来是中西印三方面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我们的兄弟民族中，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尤为伟大。《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植物种籽有苜蓿和葡萄。据李时珍《本草纲目》，张骞带回的植物又有脂麻、蚕豆、大蒜、黄瓜、胡萝卜、酒杯藤、安石榴、胡荽、番红花、红蓝花等。这些植物虽然未必都是张骞一人带回的，但是都是从西域传入的，似无问题。

自秦汉以后，又有许多新的农作物传入中原。譬如现今在华北东北种植很广的高粱，便是外来的植物。高粱一名蜀黍，又名木稷，其名首见于张揖的《广雅》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大抵在晋以后，中原才有这种植物，到了宋以后种植才渐普遍。王祯《农书》云：“蜀黍亦名高粱，一名蜀秫，一名芦稷，一名木稷，一名荻粱，此种来自蜀，形类黍稷，故有诸名。”据此，高粱大概是西南少数民族首先种植，以后逐渐普遍于全国。

不但许多植物是先由兄弟民族发明了培植的方法而后渐普及于全国，即是制作饮食的方法，我们的兄弟民族也有很重要的贡献。我们都知道我国古代和秦汉以后的膳食最大的分别是古代一

切五谷都是用来作饭，而秦汉以后，磨面的方法传入中原，不但增加了膳食的种类和滋味，并且使得麦粉更易于消化，更易于吸收营养。这种进步又是西域少数民族的贡献。在古代不但用稻黍稷粱作饭，即是麦也是用来作饭的。《说文解字》：“食，米也。”

“饭，食也。”可见古人所谓食只指饭而言，今中国人犹以吃饭包括一切膳食，仍是沿袭着古来的习惯。《礼记·内则篇》：“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稽穀。”孔疏“按玉藻：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则据诸侯，其天子则加以麦笾为六，但记文不载耳。”用麦作饭，不但上古如是，到秦汉时期仍有此习惯。东汉初，冯异进麦饭①，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

现今作面食的方法始于汉。九经中没有面字，也没有糕字、饼字。《说文解字》：“面麦屑末也。”可见磨面之法是到了汉代才有的。汉代称一切面食为饼，相传其法是从外边传入的。晋束皙的《饼赋》是一篇关于中国膳食史极重要的资料。他说：“礼仲春之月，天子食麦；而朝事之饗，煮麦为羹，内则诸馔不说饼，然则虽云食麦，而未有饼。饼之作也，其来近矣……或名生子里巷，或法出乎殊俗。”②他也指出饼的由来很近，而且是由外方传入的。在当时一切面食都称为饼，分而言之则有胡饼（即是现在的烧饼）、曼首、汤饼（即是现在的汤面）、蒸饼、煮饼（即是现在的水饺）、混沌、水溲饼（即是现在的凉拌面）等名称。面食是食物史上一个大发明。在古代麦饭仅居于次要的地位，远不如黍稷重要。自从磨面的方法传入，然后麦的应用日广，遂成了北方主要的食粮了。

磨面制饼的方法是从哪里传入的呢？束皙的《饼赋》中说：“或法出乎殊俗。”饼之中以胡饼为最有名，是由西域传入的。按埃及和西亚人发明磨面制饼的方法都较我们早。大概是西域兄

① 《后汉书·冯异传》。

② 《太平御览》卷860引。

弟民族，首先得到了磨面制饼的方法，以后又传入了中原，将中国膳食的方法推进了一步。

在饮食方面，除了制作面食以外，葡萄酒和烧酒酿制的方法都是从西域传入的。葡萄酒是汉时传入的；烧酒是阿刺伯人所发明，元时经西域人传入，成了现今中国人最喜爱的烈性饮料。

在服装方面，我们兄弟民族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汉族古代的服装，上衣下裳，宽领褒袖，是很笨重的，尤其不宜于作战。战国时，赵武灵王初提倡采用“胡服。”短衣去裳，大裤革履，贝带师比（带钩），冠加鹖尾，以便于骑射。到了战国末年，已渐普遍于各国，以后遂成了中国服装的一部分。以后如马褂、旗袍，更是满族对于中国服装的贡献。

一提到胡服，我们就容易联想到骑射。世界用马的历史，多是先有车战，后有骑兵，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在中原方面，战国以前并没有骑兵，骑兵也是北边兄弟民族首先实行的，到了战国初年才传入中原。骑兵当然要较为强大的马。对于优良马种的供给、豢养和驾使的方法，我们北边和西北兄弟民族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战国时期在战术上还有一种进步，就是冶铁术的发明。铸铁作器至晚在春秋末叶已经开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纪元前513年）：“晋国赋一鼓以铸刑鼎。”这是铁器的应用首先见于可信的文献中的记载的。不过当时是否已经用钢铁作兵器，颇成问题，因为炼钢不但需要极高的温度，并且需要极复杂的方法，在古代是相当神秘的。最早关于炼钢的故事多与南方民族有关，因之前些年朱希祖先生曾著论主张铁的兵器先行于南方。这个说法虽然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争辩。但据我看来，似乎并没有驳倒。同时铁字古文作鎗，从“金”从“夷”。铁的发明和少数民族有关，这也是一个证据。

由铁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盐，因为秦汉时期，盐和铁有一度都

是曾经政府专卖的。据古书中说：“宿沙氏作煮盐。”^①宿沙是古代东方海滨属于少数民族的一个小国，因为滨海，所以首先发明或改进制盐的方法，是极可能的。

除了衣食战术以外，我们的兄弟民族对于中国人居住的方法也有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关于桌椅的使用。在唐以前，汉族人仍是沿着古代的习惯，席地而坐，没有桌椅，只有几可供老弱人的凭依。因之古代的一切跪拜的礼节，都是以席地而坐为基础的。古人所谓坐其实就是跪，跪着本来难保持身体的均衡，有倾倚的危险，因之正坐也称危坐。普通休息时两足向前伸平而坐，称为箕踞，因两足向前，身形如箕。但这是很不礼貌的，所以《韩诗外传》上说：“孟子妻独坐踞箕，孟子入室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汉书·张耳传》：“高祖箕踞骂詈。”至于盘腿大坐，乃是后来从印度传来的，号为跏趺坐。席地而坐不但举动不便，并且也不便于工作。到唐宋以后，桌椅逐渐应用，人由席地而坐，进而凭桌坐椅，实在是生活方式的一大进步。这种进步又是我们兄弟民族的一大贡献。

西域的坐具自汉末传入中原，当时人称他为胡床，汉灵帝好胡床胡坐，见《晋书·五行志》。胡床即是现在所谓马札子，两木相交，中穿以绳，可张可合。坐在上边，双腿下垂，称为胡坐。自汉魏迄唐，豪门贵族，渐坐床榻，席地而坐的风气略衰。不过在床榻上仍是跪着，并非两足下垂。到了宋朝才有桌子椅子杌子等名称。陆游《老学庵笔记》：“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皆笑其无法度。”可见到了南宋末年，椅子杌子还不很普遍。元朝混一亚洲，西域坐椅凭桌的习惯，遂大量地传入中国了。

在艺术方面，我们兄弟民族的贡献更为伟大。中国古代的音乐音节比较单纯。战国初年已有“听古乐则睡”^②的话，但是当

① 《太平御览》卷865引世本。

② 《礼记》乐记篇引魏文侯语。

时的新声仍不过是郑卫之音。到了汉代，塞北西域优美的声调和乐器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遂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乐器方面有：（一）笛，是从羌族传入的。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二）横吹，《古今注》：“横吹胡乐，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得摩河兜勒一曲。”（三）琵琶，《释名》：“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四）箜篌，《通典》：“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五）胡琴，《文献通考》：“唐文宗朝女伶郑中丞善弹胡琴，昭宗末石崇善胡琴。”大概是唐时传入中原的。（六）羯鼓，《文献通考》：“羯鼓，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之乐也……唐明皇素达音律，尤善于此，尝谓羯鼓八音之领袖。”现今京剧中的小鼓，即是羯鼓。（七）腰鼓，现在人民最喜爱的腰鼓本是从疏勒传入的，见《通典》卷146。自秦汉以后，四方少数民族的乐器传入中原的很多，《文献通考》的乐考部分，每类的乐器，都分雅部胡部。所谓雅部即是古代原有的乐器，所谓胡部即是少数民族传入的，这类乐器不下数十种之多。

至于歌舞，自隋唐以来，单纯的古乐渐已失传，而外来的音乐，节奏复杂，曼妙动人，最受一般人的欢迎，当时人称为俗乐，以别于廟堂上所用的雅乐。《新唐书》礼乐志：“周隋与北齐接壤，故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隋唐之际，我们的兄弟民族和邻国的音乐，大量地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内容，增加了中国歌舞的优美，互相融合，遂发展成为现今中国优美高崇的音乐。

除了音乐，我们现在最受人民欢迎的杂技，其中大部分最初也是从西域传入，而后加以发展的。杂技隋以前称为百戏。《隋书》乐志上说：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元旦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细目有：“鱼龙烂漫，俳懦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种瓜，杀

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曰百戏”。隋炀帝时，经政府的提倡，花样更多了。“有舍利兽（按即狮子）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鼈龟鳌，水人虫鱼，偏覆于地。又有大鲸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涌而出名曰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两倡女对舞于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黄雀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载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通典》说：“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皆出西域”。最近我国文工团到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表演，我们的杂技备受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观众的欢迎，这些杂技都是就着我们兄弟民族伟大的创造发展而来的。

在学术思想上，我们的兄弟民族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譬如说：我们的古史传说，以为历史始于盘古氏开天辟地。这段优美的神话最初本是我们苗族同胞的传说，汉晋以来，传入中原，遂成了我们共同的古史神话。又如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佛教先传播于西域，以后由西域传入中国。最初到中国来传教的多是西域的僧人，而中国到印度求法的僧人最初也是取道西域，到达天竺。我们从法显的《佛国记》和记载玄奘求法经过的《大唐西域记》中可以看出，当时西域的佛教是如何之盛。没有西域僧寺对他们的热心帮助，他们是不易到达的。

我们都知道：佛教的传入不仅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传入，伴随着佛教的印度语言、文学、雕塑学、建筑学都传入了中国，对于中国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语言学方面，譬如反切的方法，四声的区别，三十六字母的发明，都因学习梵文，翻译佛经而引起的。在文学方面，通俗文学受着佛教的影响最大，唐代的俗讲是后世通俗文学的起源，而四声的发明尤有影响于以后韵文的发展。此外，佛典的术语，也丰富了我们的语汇，如“平等”、“过去”、“未来”、“时间”、“空间”等一切因翻译佛经而才有的语汇，成了后来我们日常口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美术方面，雕塑的方法，绘画的技术，佛塔的建造，都接受了印度的影响。这些影响，虽然来自印度，都是通过西域，才传入中原。到现在犹存在的云岗的石佛，敦煌的壁画，已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宝库。在这些举世无比的文化遗产中，我们西陲的兄弟民族一定有伟大的贡献。

自隋唐以来，西域的佛教渐衰，回教传入，西域又成了阿刺伯文化传入的桥梁。阿刺伯的文化，到了九、十世纪，到了最高境界，光辉灿烂，远超过当时正在黑暗时期的欧洲，即和伟大的唐代文化相比，也各有所长，不相上下。到了元代，蒙古的势力，西边直伸张到了东欧，中国与阿刺伯文化的交流，更是紧密。这时阿刺伯对于中国学术最大的影响是在天算方面。元时回人札马鲁丁在北京建立观象台，并制造了七种天文仪器。同时，极其精密的回回历对于中国历法的改良起了很大的作用。自元到清初，四百年间，政府有回回司天监专司，职掌历法，可见当时对于回回天算的重视。在算学方法，元代算术的长足进步也是受阿刺伯的影响，经回教学者传入的。最著名的如郭守敬的割圆术，无疑地是受了阿刺伯的影响。关于这方面，马坚教授已经有了极精密的考证，此处无需多说。此外此时自阿刺伯传入的又有回回炮，也是由西域人经手制造的。同时，中国伟大的三大发明和造纸的方法，又经阿刺伯传入欧洲，对于欧洲封建制的崩溃，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地理大发现等重要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所说，因限于篇幅，很是简单，同时也因作者所知有限，更不免挂一漏万。希望历史工作者同志们今后多向这方面展开研究，表扬我们兄弟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以增进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历史教学》1953年第7期)

白族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马 曜

白族是定居在云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白族的故乡——美丽富饶的洱海湖泊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伟大祖国壮丽河山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二千多年来白族人民用他们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开辟了洱海四周的广阔土地，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白族人民在发展中不断用先进的汉族文化滋养自己，广泛地和东南亚的古代文明国家进行文化交流。许多世纪以来，白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并不因两族统治者之间的敌对而有所中断。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今天，我们回顾一下白族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和两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应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白族在历史上对祖国文化的贡献，就不能不牵涉到白族的历史，而白族历史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目前正在研究讨论中。在这篇文章里，我仅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古代洱海区社会经济发展 和白族的正式形成

公元前二世纪时，洱海区的“昆明之属”还处于“编发随畜迁徙”的游牧经济时期（《史记》）。西汉时，洱海区七县分属于益州郡（四县）和越巂郡（三县）。东汉初，割益州郡四县属永昌郡。到诸葛亮征云南时（公元225年），洱海区已进入“土地有稻田畜牧”的半农半牧经济时期（《华阳国志·南中志》），并已

出现部落联合组织，所以蜀汉就洱海区七县设置云南郡。由三国到隋统一中国的四百年间，中原割据战争，洱海区的居民得到生养休息，人口已增加到“户十万九千三百”（《通典》），并且是“其众完富与蜀埒”了（《通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部落、部族开始活跃起来，引起了洱海区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部分地区出现了称为“名家”、“贵族”、“鉶族”的大奴隶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昆明之属”（唐初称为“昆明蛮”、“昆弥国”），分化为发展水平较高的“白蛮”和发展水平较低的“乌蛮”。后来南诏崛起，组成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军事政治联合统治。由于有统一的地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语言相同和接近的“乌蛮”、“白蛮”诸部落开始融合了。历史上流传的“白子国”，就是南诏建国以后“乌蛮”“白蛮”化，白族作为一个部族正式形成的客观反映。

南诏大理国的发展对开发 祖国边疆云南的作用

随着南诏的建立（公元738年），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由滇池转移到洱海。南诏以洱海四周的十赕和楪栋、剑川（原宁北）二节度（包括今白族自治州所辖各县和姚安、大姚、盐丰等县）为根据地，统治永昌、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上游）、银生（今景东）、拓东（今昆明）、通海、会川（今会理）、铁桥（今丽江巨甸北）等广大疆土。南诏亡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共164年。继之而起的有郑买嗣的长和国，赵善政的天兴国，杨干贞的义宁国等先后历35年。段思平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建立大理国，仍以洱海四周为基础，统治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于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为蒙古忽必烈所征服，共316年。元仍封段氏为世袭大理总管，直到明洪武十四年（公元